



改革的内涵与转型的选择

毛立言

2008-9-18 15:09:4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改革的内涵与转型的选择

——对改革内涵与方向歧变的政治经济学求解

摘要：改革在共同的市场趋向基础上，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歧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量性。经济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全部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才能给予揭示。广义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转化，是四种内涵的转变，就是最狭义的经济转型，即通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二重内涵，是交换关系系统和狭义生产关系系统两个系统的转型。现实中呈现和演化出的转型经济的三种趋向性思潮和三种转型模式，正是这二重内涵的不同状况及其不同组合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 改革内涵解析 转型方向选择

20世纪中叶在原南斯拉夫首先开启的改革运动，虽然一开始遭到一些国家的批判和抵制，但后来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先后兴起，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这一改革过程从总体上看，在初期和中期进展缓慢、曲折艰难，但到80年代末，各国的改革都进展到要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疾速转型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改革的关键阶段，在共同的市场趋向基础上，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歧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量性。这就使社会主义改革与转型，成为当今世界既引人瞩目又令人费解的重大社会现象。[1]

这场人类历史上独特、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且影响深远。正如有学者所说，“转型过程影响着16·5亿人的生活。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全面转变给人们经济条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大萧条一样，转型确实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1）（p5）这自然会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对这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在其肇始时就已经开始。在苏东剧变后的初期，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2] 由于这一“转型”与“过渡”的独特、深刻和复杂，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即“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对一段历史和某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在其尚在进行并未结束时就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虽然有了一门专门的学科，但人们对这一共同研究对象的研究，所取理论范式之多，所用研究方法之繁，所得认识观点之分歧，则甚为罕见。

在谈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时，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就是“转型”、“过渡”，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就是以“过渡”“转型”来概括和称谓这场重大社会事件的，并以“从计划到市场”来定义转型的本质和内涵。[3] 应该承认，这个定义比较形象地概括和反映了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特征。原来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从计划到市场”可以说是这场社会变革与转型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内容。但改革的内涵和本质用“从计划到市场”就能全部概括吗？“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歧变？为什么转型的结果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别？显然，这种从现象形态、或只反映了转型的部分内涵的定义，是不能全面揭示转型的全部内涵及其发生的复杂变化的。

在对这场历史性变革的研究，曾经流行以“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区分这种思路和方法。以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作为改革道路的区分，显然也不能揭示改革的丰富内涵，不能揭示改革的本质及回答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的分化。这种把改革只区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类型理论概念，混淆了改革的形态特征与改革的内涵本质，以改革的形态特征替代改革内涵本质。从表面上看，“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似乎是最明显、最符合实际的转型类型区别。然而，“激进”或“渐进”是一个表现在形态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转型的差别是内涵性差异和形态性差异的统一，两者交织在一起，而转型的形态是由其内涵决定的。这一点，就连有些主张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科尔奈就认为，所谓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差别，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是“改革”还是“革命”。

我国学者为了对这场改革的独特性（即它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第二次革命”）进行准确的把握，从改革初、中期，甚至至今，多数人是“制度”与“体制”的区分和联系来认识改革的性质和特征的，认为我们进行的是“体制”改革，而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没有也不能发生变化的。这种用区分“制度”和“体制”两个范畴的方法来把握改革的性质和内涵，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改革的性质和体现改革的内涵的。但从更准确的要求来看，还需要把“制度”和“体制”与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的联系上给予具体界定。

毋庸置疑，“转型”向现有的一切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一重大社会现象所蕴含的问题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同时“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向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应该承认，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完善度与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现象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的深刻性和挑战性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还需要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更基础的理论把握，还需要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揭示其性质、内涵和发展趋向。

社会经济形态结构与转型内涵

任何社会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换。人们对社会运行和历史变革的认识，如果脱离了它的结构，就会模糊了内涵，就会成为是无内容的历史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说，“但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p145）因此，要揭示转型的内涵和趋向，必须注重对转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进行考察，从系统结构的变动状况来具体分析各种转型模式。因为“转型”的内涵和趋向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决定的。

90年代以后，转型经济学研究多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方法、模型来进行的，就是以效率为标准，注重经济体制的功能和机制分析方法，进行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对比。它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中央计划机构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的不真实性来否定这种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认为传统体制有效运行的隐含前提是：（1）完全信息；（2）单一利益主体。但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会遇到信息和激励这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必须以能够有效解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这种改革的单一市场化内涵论认为，转型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型就是市场趋向改革。这种转型经济的单内涵论是以转型的单结构论——交换关系为依据的。虽然，其中隐含的一个理论涵义是市场经济天然以私有制为基础，但这种观点所持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内在统一性，实际上就在理论上肯定了转型的结构、内涵和趋向的唯一性。这种观点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路在转型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交易（交换）为中心来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的。这种比较流行的用“市场化改革”来统称转型内涵的观点，即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反对在市场经济前面加性质定语的观点，就是这种单一转型内涵和趋向论的通俗表现。1 仅从学理上讲，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只注重交换关系而忽视生产关系的研究思路，也是偏狭的、脱离实际的，是不符合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内在结构的，因而是不能全面科学揭示这场历史性变革的全部内涵的。从较广的视野看，或者说从客观现实来看，转型必然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是脱离实际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休克疗法”也是简单化的，浪漫主义的。[4]

对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基础的单一市场化转型内涵论，不仅对转型持公允态度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表示了异议，他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用于转型经济；（3）（p）甚至对转型持更彻底的自由主义态度的学者也表示了不满。萨克斯等人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中指出，相对经济转型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来讲，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的方法太简单，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是，将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研

研究经济转轨，当正式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将这种超边缘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4) (p)

萨克斯等人主张的转轨既是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又是宪政的转轨，即政治制度的转轨，其内涵和框架显然扩展了转型的单内涵论。它把转型看成是一个大框架中包含一个小框架，即宪政转轨中包含着经济转轨。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最终结论——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反对这种主张向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转变的观点，但他们这种对转型内涵认识背后的理论框架，相比那种仅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来认定改革内涵的看法，在理论框架上有很大扩展。他们潜在地承认了转型内涵的非单一性，承认基本制度的选择决定转型的类型实际上是承认了转型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性。

经济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全部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才能给予揭示。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许多学派。但是，客观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和各种方法进行比较，应该承认，马克思创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还是最宏大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的分析方法。²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结构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结构图式。笔者称之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三层次二重结构”理论和“社会经济结构（广义生产关系，亦即社会经济关系）二重基本结构”。³ 依据这一理论框架，社会形态的系统结构存在着四个层次的基本维度，即生产力形态，交换关系系统，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其核心是政治关系系统）。³可以看出，这里突出了“交换关系系统”，就是要把把原来丢掉了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恢复为狭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二重基本结构。恩格斯曾提出，在以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为基础的较为复杂的生活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既紧密联系又在一定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经济关系子系统，亦即“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5）(p489) 这样，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结构是由纵横两个坐标系的具体历史契合构成的理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结构都是由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狭义生产关系系统和并不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交换关系系统的历史性叠合构成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

逻辑地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三层次二重基本结构和四重基本维度相适应，经济转型有四重基本内涵：一、生产力系统的转型，这表现为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也就是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二、交换关系系统的转型，这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从消灭市场经济到恢复市场经济；从没有真正的货币的恢复真正的货币；三、狭义生产关系系统的调整，这表现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四、社会基本构架的转型。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对分离以及政治关系系统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⁴

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对转型经济的内涵就可以有一个系统的清晰的把握。广义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转化，社会经济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在发生变化，是四重内涵的转变。而在理论分析中，为了一定的需要，则可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但是，就是最狭义的经济转型，即通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二重内涵，是交换关系系统表现为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产权关系或狭义生产关系的转变的结合，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二重基本结构决定的。

本文论述的“转型”就是“狭义转型”，也就是指交换关系与狭义生产关系这二重结构的转型，亦即通常所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依据这种理论框架，原来用以界定改革内涵的划分“体制”与“制度”两个范畴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从与经济关系的不同结构与层次的联系来深化，即把“制度”范畴与狭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决定社会基本制度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而“体制”则是与交换关系相联系的范畴，它由交换关系的性质与状态（商品—市场经济）来决定。

经济体制改革的二重内涵决定了改革的两大任务和两条主线：经济机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改革的二重内涵也潜在地决定着，在商品经济的复归和共同市场化趋向基础上，产权制度安排和选择中的趋向差异和道路分歧。

